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3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62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册

书号11310·20 定价1.25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回 忆 录

-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 李维汉 (1)
-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 (49)
-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80)
-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
 关系 黄火青 (100)
- 开辟辽东根据地 肖 华 (113)
- 老航校诞生前后 黄乃一 (151)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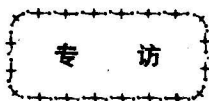
-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张 颖 (190)
- 我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办公室 (212)

关于胡世合事件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工运组 (228)
重庆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青年组 (246)



屈武谈周恩来敦促张治中释放被关押

在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的情况欧阳如华 (272)

来函摘登 (280)

本刊征稿启事 (282)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 延安干部教育

李 维 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生前嘱我们转告读者，对他的回忆录“敬请提出批评建议”。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

（一）中央干部教育部的成立

1. 成立时间。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同年十二月底通知我去延安任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我在陕北公学分校任校长。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我从关中栒邑看花宫出发，同行的还有孙力余、何定华等。他们到延安以后，也在干部教育部任职。

从栒邑到延安六、七百里地，我们走了一个多星期。到延安以后，同党中央，主要是洛甫（他是干部教育部部长，同时又是中宣部部长）进行联系，研究干部教育部的成立工作，并决定在中央宣传部右侧（南边）山沟口设立干部教育部机构。

2. 成立原因。首先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革命形

势带来的迅速变化，需要我们共产党人重新学习。尤其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懂得了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和抗战时期的右倾，从思想根源上说，都是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都是教条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毛泽东强调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又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六届六中全会就全党的学习问题作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干部教育部就是在

这种全党开展学习运动的形势下产生的。

其次，延安干部学校的迅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加强统一领导。在延安，除了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干部学校以外，直属党中央各部门的干部学校就不少。党中央到陕北以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了中央党校，接着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办了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在抗战即将开始，国共两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前夕，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把红军学校改编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为抗战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成立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招收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培养抗战的干部。同年十月，创立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冯文彬、胡乔木负责）。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培养从事抗日文艺运动的干部。同年五月五日，创立了马列学院（院长洛甫，副院长王学文），专门培养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干部。以后又成立了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王明）和工人运动学校（张浩负责）。这些干部学校分属于党中央的各个部门。为了加强统一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

第三，干部队伍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抗战以前的老干部不多，绝大部分是抗战以来的新干部；老干部一般说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还有文盲，都需要进行

教育、学习。

3. 工作任务。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央为着（一）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与教学方法；（二）适当地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课程；（三）有计划地进行招收新生工作；（四）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五）总结各学校、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等，特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兼任部长，罗迈同志为副部长。现已在中央驻地附近设立机关，并开始工作。今后各学校各机关凡有关于干部教育的计划、教材与工作报告、检查工作总结等，请随时送交中央干部教育部。”这个通知明确了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我们以后在干部教育部所做的工作，就是通知所规定的内容，即统管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中央以后又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在短时期内实际所做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

4. 机构演变。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时的机构很简单，下设两个科：党内干部教育科，科长曹轶欧、副科长章夷白；国民教育科，科长何定华。部秘书陶希晋，兼管行政工作。洛甫不住在部里，我同大家住在一起，一共十

几个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十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还是我们两个人。原干部教育部的党内干部教育科和国民教育科统归宣传部建制，人员略有变动，许之桢任国民教育科科长。

（二）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发展的 三个阶段和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延安的干部教育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全会上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以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又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提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这里所说的学习，不仅是指干部学校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指在职干部的学习，也就是从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到各机关事务人员的文化学习。

中央干部教育部实际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正是在职干部教育。因此，我着重回顾在职干部教育，同时兼及干部学校教育。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二、三月制订并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五月二十日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到一九四〇年六月进行年度总结，历时约一年余。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第一，制订并公布教育计划。我们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延安就开始制订《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第一期计划），二月初即完成，三月正式公布。但是由于进行生产突击，绝大多数单位实际未执行。

第二，召开动员大会。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会上，毛泽东讲话，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学习的方法，要求大家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并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洛甫也讲了话，强调在职干部学习须有持久性和恒心。我在会上作了在职干部学习的动员报告，主要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强调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当我引用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欣慰地笑了。关于教育方针，我说：“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的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根本原则的具体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要

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要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

在动员报告中，我还提出了对在职干部学习的希望。我说：“学习，要有恒心，有经常性。就是要经常地学，不间断地学。只要有恒心，每天学一点，日积月累，就会有可观的成绩。譬如每天读五页书，一个月就可读一百五十页，一年就可读一、二千页。有些同志看轻每天五页的成绩，认为要读书，就只有进学校去，读它一年半载。且不讲我们有没有可能使所有在职干部都进学校，就是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年半载的时光也只能获得入门的知识。古人有言‘做到老，学不了’，要真正学些东西，仍不能不靠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最靠得住的学校，仍是‘在职干部学校’。当然在职干部是以工作为主，学习只能占小部分时间。但是，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长期的学校，而且是最能把学习与实际密切联系起来的学校。所以，只要有经常性，有恒心，真正的学问一定可以从这里磨炼出来。”

这次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了。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约有二千多人。可以说，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学员最多，师资最省，

设备最简单，但可以取得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成效的大学校。

第三，建立学习制度。一是建立了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肯定了干部教育的教学程序及其课程，指出“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因为如果把在职干部的学习完全放到业余来进行，则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是难以做到的。二是进行了教育和课程的安排以及人员的编组。在进行具体的教育和课程安排时，实行以“少而精”为原则，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定出学习和研究的程序，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课程。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和军事理论。对于初、中、高级课程，如是干部学校可依次分期进行；如是在职干部，则依干部的具体

情况，参照初、中、高级的课程，学习和研究其中一种，最多两种课程。把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人员分为三类：甲类，主要是担负领导工作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老干部，学习联共党史。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但党龄较短的新干部（当时新老干部的区分以抗战爆发前后参加革命为标准），学习党的建设（以《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为教本）。丙类，主要是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多数是从事事务工作的同志，学习文化为主，兼学党的建设。因为这是第一年的学习，对在职干部来说，是一个打基础的学习，所以，这一年对所有的干部都没有安排学习高级课程的内容。

三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在这个指示里，进一步把在职干部按文化、理论程度分为四类：一、二类是文化理论水准较高和较低的老干部，三、四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农出身的两类新干部，并按类规定了不同的课程和共同的课目。指示还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一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学是基本的方法”。为了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指示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

验，并举行奖励（奖励以集体为主）。

从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到党中央连发的两个指示，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第四，编审干部学习教材。在干部学习中，教师和教材的需求特别迫切。一九四〇年六月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讲话，讲得十分具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前方学习中的困难，首先是缺乏教师。去年（指一九三九年）邓小平同志带了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别人从后面把那两个同志留下了；于是乎打官司，打了整整半年；结果还是从总司令部抽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去替他们‘顶赎’回来。”“我们的第二个困难便是书本子。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办了规模不下于延安的印刷局，延安出了一本新书，我们马上就翻印，但还是‘供不应求’。”延安的情况，比起前方来当然好得多，但是，当时延安的印刷出版条件也很差，只有一个解放社，一个中央印刷厂，纸张缺乏，任务很紧，要出版几千名干部的教材，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办到。

延安干部学习教材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例如，作为高级课程的《哲学选辑》，就是马列原著的辑录，而《联共（布）党史简明

教程》和《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等都是翻译的。二是我们自己编写，例如，党的建设教材，中国问题教材，中国历史教材等等。最早编了一本《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编了一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那一篇。该文题释对起草经过作了说明。关于第三章《党的建设》，我曾写过两节，都送毛泽东看过，记得在第一节里曾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作了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我在讲课时还宣读了这个顶批。第二节是写的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毛选》中只有两章。）当时，中央干部教育部约请一些同志或组织专人编写教材，初级课程中的《政治读本》、《国文读本》等都是干部教育部的同志与专家共同编写的。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还是搞了不少东西，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第五，加强干部学习指导。干部学习虽然主要靠自学，但给予适当的辅导是完全必要的。我们采用的办法，一是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为了培养和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又特别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各学校各机关担任或准备上课的教员一律参加。这些研究会的任务是指导延安的干部学习，包括编写教材或参考材料，组织专题报告会等。这些研究会在在职干部的学习中

起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所以，后来又成立了哲学研究会、时事问题研究会等。二是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如学习党的建设，我们就聘请陈云为总指导。三是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大家欢迎。请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为在职干部作报告的倡议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以身作则，多次为延安的干部作报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中央干部教育部组织的，演讲在七月八日和十二日接连讲了两个下午。王震（从前线回延安以后）、张鼎丞也应邀给干部作过报告。这类报告从动员大会以后到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年时间里一共作了八次。至于时事政治性的报告，则平均每月有两次。

第六，检查和总结。我们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一年时间中，对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情况进行过三次大的检查。每次检查以后，我们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延安的学习。第一次检查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进行的。检查以后，我写了一个《怎样展开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总结，刊登在《解放》第八十六期上。第三次检查是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进行的。同年六月六日，在中